



粟裕在浙西南的光辉岁月

□ 周德春

1934年8月至1938年3月，粟裕率部挺进浙西南，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付出巨大牺牲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区孤军奋战，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、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挺进浙江

1934年6月，在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前夕，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，深入闽浙赣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，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，推动抗日运动。

7月6日晚，先遣队约6000人从江西瑞金出发，开始浴血征战。其间，一度转战浙西南的庆元、龙泉，进占庆元县城，取得竹口大捷。10月中旬，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.6万余人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，开始长征。至此，先遣队奉命保存实力，进入闽浙赣苏区，结束4个月的“小长征”。先遣队以弱小的兵力，浴血敌后，征战1600余公里，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，高举抗日大旗，并为各游击区留下军事骨干，作为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35年1月，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的红十军团（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），在江西怀玉山山区遭敌重兵包围，指战员大部牺牲，战略策应长征的行动遭受挫折，粟裕指挥先头部队浴血突围，转移至原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广财山，找到闽浙赣省委，保留了革命力量。

省委随即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电令，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，组建红军挺进师，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。浙江是国民党统治腹地地区，斗争环境特别恶劣，1927年6月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屡遭破坏，不到两年就更替了十位书记（代理书记），致使1929年4月中共中央被迫撤销浙江省委建制；全省相继爆发的60多次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。以粟裕为师长、刘英为政委，仅500余人的挺进师，不惧兵力弱小、弹药匮乏、毫无接应，抱着继承先烈遗志、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，誓死出征。途中遭敌袭击，电台被毁，与上级失去联系，陷入孤军奋战后，依然义无反顾，决心以自己的行动，打开进入浙江的局面。

为实现战略转变，部队在闽北开展整训，建立政治委员会加强领导，以适应游击战。接着，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，吸引、调动敌人，造成敌人误以为挺进师将立足闽浙边，然后于4月下旬在庆元斋郎精心部署，迎击被吸引而至的近4000敌人，取得大捷，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。

转战浙西南

斋郎大捷后，粟裕和刘英率部乘胜挺进浙西南腹地，在松阳县境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的欢迎后，分兵以发动群众，集中以打击敌人，开辟根据地。1935年6月上旬，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，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，部署创建根据地。7月，粟

裕率挺进师师部机关进驻至遂昌县王村口，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。

为吸引和牵制敌人、战略策应长征，挺进师广泛开展游击战。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，然后开仓济贫，打土豪分发浮财，发动群众投身革命。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，主动出击，袭击大小城镇19个，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。在松阳、遂昌、龙泉、江山、浦城五县间建立革命根据地，轰轰烈烈地开展查田、插标、分青苗的土地革命。

挺进师的斗争，迅速吸引了国民党军。1935年8月，国民党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，大举“清剿”浙西南。粟裕等创造性地实行“敌进我进”，留下第二、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，率主力突破敌包围圈，挺进敌后，转战闽浙边，吸引、调动敌人，后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，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，联合开展斗争，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。

1936年2月以后，刘英率突击队 在浙南开展工作；粟裕率牵制队广泛游击，数度转战浙西南，在龙（泉）浦（城）江（山）遂（昌）边建立游击根据地。1936年6月，粟裕率部收复王村口时，仔细侦察分析敌情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，然后根据敌人布防严密、当地老农判断近日有暴雨天气的信息，率部于深夜出发，跋山涉水绕过王村口向衢县方向开进。途经独口村时只缴敌哨兵的枪械，任凭敌哨兵逃回王村口，待敌人确信红军已开赴衢县时，又把部队秘密拉回到龙泉住溪，然后利用暴雨大雾天气和敌人放松布防之机，突袭王村口，无一伤亡地收复王村口。这次行动表现出粟裕坚持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。

1937年初，国民党再次大举“清剿”挺进师，粟裕等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，将部队“化整为零”，分兵游击。4月，粟裕率部活动至遂（昌）宣（平）汤（溪）边区，与谢文清部会合，建立游击根据地，依托根据地出色开展反“清剿”，使敌哀叹“未奏肤功”。

实现抗日夙愿

自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开始，粟裕始终把宣传、推动抗日运动作为重要任务，在挺进师开展活动的各地，到处都有“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力量”“废除卖国条约”等宣传抗日的标语。

粟裕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，不仅一再呼吁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，而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，自觉地根据形势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，用实际行动争取团结抗日。一是将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，不再打土豪筹集经费，而是根据地土豪绅的负担能力，向其征收抗日捐；二是推行“白皮红心”的两面政权，对国民党乡镇长和保甲长，由镇压改为争取，使他们为红军服务；三是区别对待士绅和中等商人，进步的欢迎，中立的允许来去自由，继续营业不受侵犯，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，发展山区经济，改善群众生活；四是改“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兵枪当红军”为“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，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”；五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城镇知识分子的工 作，许多知识分子手中的书报，成了粟裕了解和分析形势的重要信息来源。

1937年9月，率部活动在浙西南的粟裕，根据形势和“共产党投降了”“红军被收编了”的传闻，敏锐地觉察到国共两党可能已开始合作抗日。得到证实后，他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倡议合作抗日。9月18日，遂昌县当局复函，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“接洽”。高度警惕的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，要求对方派代表到根据地谈判。

10月14日，粟裕指派谢文清、刘清扬与遂昌县当局代表在根据地中心门阵村举行和谈，达成合作抗日协议。10月19日，粟裕率部开赴浙南集结待命。离开门阵前，许多根据地农民积极分子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抗日，但粟裕坚持不带走有家庭负担的同志，不增加群众负担，只带走了没有家庭负担的7人。

1938年3月18日，粟裕率挺进师主力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离开浙南，奔赴皖南前线，开始驰骋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。



革命战争年代的我军审计工作

□ 王大伟 张 涛

我们党历来重视经济监督工作，建党之初，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、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就设立审计机构，以经济监督配合政治斗争，发扬民主反抗独裁专政。1927年，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，在随后的斗争实践中，党极具远见地开创发展军事审计监督制度，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。

在土地革命战争 中应运而生

1927年9月，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。三湾改编除了把党支部建在连上，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，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士兵委员会，参与部队管理，监督经费收支，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。1930年9月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《红军士兵会章程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士兵委员会的宗旨、职权、组织、经费、工作等，规定士兵委员会有审查军队经济、监督军队给养的权力。宋任穷回忆他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时，士兵委员会的工作，一个是政治民主，一个是经济民主，分伙食尾子，管理伙食，管理经济。从士兵委员会的地位、监督对象和方法来看，已经初步具备了审计监督的功能要素，可以看作是人民军队审计制度的雏形。

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，为加强节约，反对贪污浪费，以群众性监督为主的军内经济监督开始向专门专业的审计监督转变。1932年2月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《关于经理工作问题提案》的训令，并附发《经济公开条例》。依据该条例，军委设总审查委员会，军、师级部队普遍建立审查委员会，每月审查各级经理机关账目一次。各级审查委员会独立履行军事经济监督职能，标志着红军审计机构

和审计制度的正式建立。

1933年9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后，红军内部也相应成立了审计委员会，编设了稽查员。长征期间，红军也坚持了审计制度。比如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设立了审计委员会，主任是贺龙，政治部主任、保卫部长、参谋长、供给部长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。

在全民族抗日战争 中淬炼成长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中央军委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普遍设立了审计机构，逐步建立起纵向多级的审计体系，健全完善审计法规制度，卓有成效地开展预决算、开支消耗等审查监督工作。

1938年11月，毛泽东批准颁布《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暂行条例》，规定军委在主席指导之下设立财政委员会，下设审计处，为执行权力机关；凡军委所属后方各机关、部队、学校的按月或临时收支预决算，必须先行送交审计处审核。1938年底，毛泽东签发的《中央军委关于严格预算制度的通令》明确，每月预算须按期编制于上月25日前、每月决算须于下月10日前送达审计处审核，由财政委员会批准后，方能由供给部发款报销。

1939年，八路军总供给部财政处下设审计科负责审计工作。1940年10月，八路军129师颁发六项制度，审计制度就是其中之一，规定在师一级成立审计委员会，负责审计师旅团预算、决算。1941年春季，八路军总部颁布了《审计法规》，明确规定总部设立总审计委员会，各战略区设审计委员会，旅团设审计组，总审计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下设审计处；实行团、旅、师（战略区）三审制度，总部总审计委员会为最后稽核机关。八路军审计处处长刘喻缙云回忆，部队的

沙家店战役：打了这一仗，就过坳了

□ 卢静静

进占绥德后，除以整编第1师留驻绥德外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分两路向葭（佳）县方向急进。同时，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率部从榆林南下，企图与刘戡部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米脂、葭（佳）县之间。

巧用弱点，抓住战机，诱敌进入我军预设战场

钟松的整编36师，是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主力师之一。钟松此人刚愎自用，自恃援榆有功，异常骄傲。他在8月13日进入榆林城，不仅不休整补充部队，还把辎重留在榆林，14日便马不停蹄地率2个旅南下，孤军冒进，扬言“一战结束陕北问题”。彭德怀在撤军榆林后，密切关注敌情的变化。在充分掌握分析敌情后，决定利用钟松部骄横失慎、孤军分兵冒进、长途跋涉等弱点，抓住36师南北夹击之势尚未形成的战机，诱敌进入我军预设的有利战场。

当时，西北野战军集结在榆林东南、沙家店西北地区，北临沙漠，东为黄河，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敌军，可以说是“侧水侧敌”，回旋余地很小。但这里正是钟松南下的必经之路，野战军在此隐蔽埋伏是最佳的安排。8月15日，钟松整编第36师沿着无定河南岸行进，没有走西北野战军原预想的鱼河堡公路。由于隔河出击不利，彭德怀便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在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。8月17日，钟松以第123旅为前队，由镇川堡绕过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，师部则率第165旅为后梯队，在沙家店以西地区跟进，准备在乌龙铺与刘戡会合。

一切开支必须填造月份和年度预算、决算，并附人员马匹增减表、报销单据，经审计处审查，才能通知供给部门拨款或冲销预支；对军工开支审查也非常严格，每支步枪、每发子弹、追击炮弹的成本，尤其是原材料消耗都要审核。

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，部队整编为7个师、1个独立旅，有的师专门设立了审计科。同年，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发出通知，决定各级军政委员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要求各级审计委员会应有专门的可靠查账人员负责按月审计，终结一次，按级负责向上级报告一次。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期间，兼任苏中军政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任，1944年11月，在苏中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报告时，他批评苏中区“现在养成一种竞赛浪费的风气，似乎越阔气就越好”，要求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、审计制度，厉行节约。1941年8月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专门讲到建立审计制度，“师设审计委员会，以张震兼主任，统一军政党经费收支之审查”。

这一时期，各根据地也都健全完善了审计制度。审计人员坚持严格审查，特别是对经费支出的核销相当细致，包括小到5角钱的路费、6角钱的烤火费等，同时也注重实事求是。习仲勋任关中分区领导期间，专门写信给陕甘宁边区审计处曹力如处长，反映经费超支具体情况，逐月说明数额及原因。审计处据实进行了核准。

在解放战争中发展壮大

解放战争时期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供应需求不断增大，中央军委更加重视审计监督，进一步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审计体系更加完备，功能发挥更加全面。

这一时期，各野战军都结合实

际，设立审计机构，建立审计制度，开展审计监督。1948年12月，军委后勤会议决定统一全军的审计制度，野战军、大军区、军、二级军区分别设置审计委员会，各团与分区要成立审计小组。彭德怀在会议上指出：审计制度也很好，“建了审计制度就能大公无私”。

军队审计的监督领域十分广泛，其中军费预决算审计居于首要地位。如，1948年西北野战军工作总结中记载“野战二院造假预算……津贴等，数目不详”。1949年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审计处发现“作预算不从实际出发或不按预算报销共有八个单位……独二十四师三月份决算上下差别颇多”。平原军区供给部审计科在审计预算时，指出：物价是逐月上涨，又加部队处于分散清剿，部队经费曾经发生恐慌。于是提出了三条解决对策，体现了在军费预算审计中，审计部门发挥了建设性作用。

除审核和批准各种预决算外，审计机构还要掌握人员马匹数目，有组织有计划地检查和督促各后勤机关贯彻各种制度，克服贪污浪费现象。如1946年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郝鹏举在我军强大压力下，于台儿庄、枣庄前线率部起义。陈毅安排该部到山东莒县休整。其间，郝鹏举向我方申报领取给养实力为5万人，经过审计人员深入现场，发动所驻各村党支部，逐户清查，发现实际只有3万人左右，避免了一起严重虚报冒领的问题。同时，经费、粮秣等财物收支，战场缴获及接收、没收、征借以及其他各种收入，各项开支标准的制定，财经政策制度的执行等，都纳入了各级审计机构的监督范围。

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审计工作，历经战火洗礼，留下弥足珍贵的审计精神，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工作业绩，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审计监督制度存续、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和新时代改革重塑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经典战例

西野主力正快速向沙家店方向集结，对其形成包围之势。钟松一面命令部队占领阵地，抢修工事，一面急电刘子奇，令其前梯队123旅向沙家店靠拢。123旅因畏惧我军伏击与夜战，决定先派附属的493团先行驰援。

20日，大雨停了。拂晓，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对仓促转入防御的敌整编第36师发起攻击。西野第1、2纵队向沙店店的钟松师部及165旅发起猛烈进攻；紧接着，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西援的敌第123旅包围在常高山附近。就这样，钟松的整编第36师的两个旅被分割包围。为了在刘戡赶到之前，迅速消灭被困的第36师，彭德怀发出歼敌动员令，要求部队继续发扬无限英勇精神，立即消灭该师，胜利完成战斗任务。全军振奋，斗志昂扬，向着钟松师展开猛烈冲击。

战至20日17时，除钟松和第165旅旅长李日基化装带少数人乘黑夜逃脱外，其余均被消灭，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。

沙家店一役扭转了西北战局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一仗对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，指出：“经此一战，局势即可改变。”该战役的胜利，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，扭转了西北战局，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。彭德怀评价这次战役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，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。

